

王康武 著

华人与中国



王康武自选集

学人名家自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赓武
著

学人名家自选集

许纪霖
策划

王赓武自选集

华人与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王赓武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学人名家自选集)
ISBN 978-7-208-11244-5

I. ①华… II. ①王… III. ①华人—历史—世界—文
集 IV. ①D634.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9644 号

责任编辑 李 莹

封面设计 王晓阳

· 学人名家自选集 ·

华人与中国

——王赓武自选集

王赓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4.75 插页 4 字数 399,000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244-5/K · 1967

定价 48.00 元

王赓武：关注海内外华人的忧患与命运（代序）

《时代周刊》记者李怀宇访问王赓武

王赓武先生今年八十一岁，依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王先生举止尽显绅士风度，一口地道的国语听不出乡音。研究所如今所在的校园，正是他当年就读的马来亚大学。临近中午时，他健步如飞地带我们游览校园一角，一路讲述母校旧事。

王赓武祖籍江苏泰州，父亲王宓文早年应邀到南洋教书，曾任印尼泗水的第一间华侨中学校长。1930年，王赓武在印尼泗水出生，1932年随父亲到马来亚霹雳州怡保，接受西方正规英语教育，在家则受父母的传统中文家学，因而兼擅中英双语。王宓文自认侨居在外地，不是移民，出来工作总有一天要回到祖国。1946年王赓武中学毕业，1947年初便举家回国。

1947年，王赓武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他回忆：“因为我父亲读外文系，他劝我读外文系，他喜欢文学，我也喜欢文学，我从小就看他收集的书和杂志。他不仅喜欢中国的文学，也很爱好西方的文学，所以我从小就看西方文学。”

王赓武的父亲在中央大学附中教书，薪水不高，生活很苦。而他在热带住了几十年之后回到南京，受不了冬天太冷，病得相当重。王赓武的母亲丁俨觉得再留下来丈夫恐怕病情更重，夫妻还是回到南洋。

在王赓武读大学期间，中国局势变化出人意料。王赓武记得，一般的学生对国民党政府都不满：“并不一定是左倾或者是共产党，不满的是政府不民主或者是太过亲美。很多人都反对内战，战争那么多年，刚刚和平又要再打，不能够好好地建国，重新恢复国家的经济。”王赓武印象最深的是经济一塌糊涂，法币不值钱。

父亲从南洋给他稍微寄了一点钱，他就觉得比同学富有。而老师在课外还要找别的事情做，不然应付不了生活，大家都苦。王赓武说：“京沪一带本来是中国比较富有的地方，但是到处都是穷得不得了。我还记得像上海、南京的路上乞丐多得不得了，乡村里很苦，很多人就想办法到城市去，但是到城市里也没有事情做。”

解放军打到江北的时候，学校就解散了，像王赓武这种外地来的学生，无家可归，所以还住在学校里好几个星期，也没有上课，就自己看书。王赓武没有兄弟姊妹，他的父母在南洋非常着急，他的叔父在上海，还特地赶到南京告诉他：“你一定要回去！”当时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天天还开，奇怪的是没有人管，火车两边都开着，只管爬进去就行了。王赓武的同学把他从窗口推进火车。王赓武到了上海火车站，碰上戒严，便一直坐到天亮，他的叔父买了一张船票，让他坐小船到香港，再到新加坡，回到了怡保。

王赓武在怡保工作了几个月，恰巧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成立，便以本地中学毕业的资格申请入学。1949年马来亚大学开学，王赓武当了一年级新生，重新再读。马来亚大学用的是英国制度，头三年读三个学系的课，第四年可以选一个专业课。王赓武头三年念文学、历史、经济学，第四年选专业课时，他选了历史：“其实我是喜欢文学的，主要的理由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教授离开了，到剑桥当教授去了，其他的教授我都不大感兴趣。经济很有用，但是我对经济系的教授不欣赏，我不大同意他的教法。历史教授蛮有意思的，既然不读文学的话，历史还是比较接近一点。”

王赓武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完成学业，留校攻读研究院，旋负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伦敦，王赓武发现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很少，他幸运地碰到一两个懂中国史的教授，更多的是自己看书。他说：“英国制度跟美国制度不同，美国制度是研究生要老师来指导，英国不指导，老师选你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自学，自己到图书馆看书。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是我自己选的，根本没有上课，三年就自己看，自己写，写了之后交上去，好不好自己不知道。”这段时期，王赓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五代史。

1957年，王赓武获得哲学博士，回到马来亚大学教书，1962年出任文学院院长，三十三岁荣升马来亚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1968年，王赓武作为首位华人应邀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及系主任，1975年至1980年任该校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1986年，王赓武应邀出任香港大学校长，主政十年之久。他回忆：“坦白说，我没有想到港大。因为我不大愿意全部搞行政工作的，当大学校长就无法做学术研究，至少要放开一点。我考虑了一下，最主要的理由是我认为香港回归的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我一直是对中国近代史很有兴趣，又是在英国的殖民地生活过，我对英国离开殖民地的过程不仅是有兴趣，而且是亲历过，我看过他们怎么离开新马。那时候关于香港回归的问题，中英的谈判已经结束了，我想亲眼去看看。我对港大也有感情，因为黄丽松当校长时也找我谈过。既然他们来找我，我就把学术的工作放开，至少尽我的力量把港大搞好，主要是如何在回归的过程适应一种新的环境。”

1996年，王赓武在香港大学荣休，受邀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是澳大利亚公民，当时本来准备回澳大利亚当教授，恰得新加坡方面盛情邀请，而王赓武的太太小时候在新加坡住过，便说住几年再回去吧。没想到一住十五年，比在香港的时间还长。王赓武笑道：“我从进大学读书一直到现在，换了好几个大学，但一直在大学里面。”

王赓武治学，主要围绕三个学术领域：唐至明中国政治与外交（中国中古及近世政治史）、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与外交（近代与当代中国政治史）、海外华人历史与政治（海外华人史）。近数十年用功最深的是海外华人史研究，从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分析出发，思考世界各地华人的认同困境与内外心理张力，进而提出可行的出路与理想。王赓武以世界为视野，不以国界语言肤色作计较，用心不离海内外华人的忧患与命运，避免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主义，也不陷入拒外排他的狭隘民族意识。

王赓武一生在许多地方生活过，怀抱“天下华人心”。他认为近数十年来华人移民潮的重大变质，是以商人及劳动者为主力的19世纪形态，转变为以知识、学历与专业为基础的20世纪末新移民。新一辈海外华人希望一方面完全地融入当地社会及其主流语言、文化，一方面仍然保留若干基本的中华文化生活意识。他提倡的“海外华人”一词，如今渐为学界通用。

临行时，我问：“您还会在新加坡生活下去吗？”王先生说：“不知道，我已经八十一岁了，无所谓了，什么地方都可以。”

《时代周报》：中国传统是文史不分家。你原来喜欢文学，在马来亚大学念到第四年时才专修历史，用历史眼光看现实世界有什么新的思考？

王赓武：文史是不分的。马来亚大学是英国人的历史教法，开始教西方到亚洲的历史。大概从1498年开始，葡萄牙人到印度来的那段历史，是中西早期的贸易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一直到殖民地帝国主义。他们也承认是帝国主义，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代，知道帝国主义的时代要结束了。所以，历史学家很感兴趣，英国怎么发展贸易关系，西方怎么到北美、南美去，怎么到亚洲来。但是亚洲的反应如何，研究的人很少。中国当然有学者注意到中国的问题，但是其他亚洲人没有太注意，所以当时题目倒是蛮新鲜的，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让我们想起亚洲为什么会让西方侵犯得那么深，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地方被占据了？当时最感兴趣的是像印度这么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却让几万英国人控制了一两百年，为什么我们亚洲人让别人欺负得这么厉害？当我回来马来亚大学念书的时候，中国也解放了，整个亚洲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地主义气氛很浓。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学生之间都整天讨论，帝国主义的尾声怎么回事？迟早他们要走了，但不愿意走，最后逼得英国也没有办法，印度独立了。我们这些东南亚国家正在争取独立，争取自由，大家都很关心印度，印度从帝国主义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跟中国不同，因为中国没有真的被外国人占领，中国是内战的问题。我们在殖民地生活过，所以，独立之后要怎么样建国，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从中国回到这里再念书的时候，重新考虑这些新的问题。学生都谈后殖民主义，到底怎么建国，新加坡是个小岛，是属于英属马来亚，印尼是荷属东印度，都不是国家，很多民族都在英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之下，是多元民族的社会，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独立的国家，至少新加坡是绝对没有这个想法的。当时要独立的话，是整个英属马来亚，英国人如果走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新的国家。英国人也有这个意识，想在走之前成立一个比较友好的新国家。总之，我既然到这里生活了，就要了解这个国家是怎么一回事。这种多元民族，多种宗教，多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英国是属于西方的系统，印度是另外一个系统，马来民族又是另一个系统，中国语言这么多，也是另外一个系统，这四种语言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社会又有不同的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将来怎么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参与这种讨论，念历史，跟当时的政治多多少少也有些关系。

我本来的兴趣还是在中国，尤其是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为什么中国会分裂得这么厉害，要打几十年的内战才统一？但是，那个时候马来亚有马来亚的

共产党，“马共”的大多数领导都是华人，既然中国共产党胜利了，整个东南亚到处都有共产党，很兴奋。英国殖民地政府跟马来亚的上层阶级的人很担心，因为英属马来亚华人人人口当时占百分之四十多，如果连新加坡在内的话，差不多百分之五十。所以，他们就紧张了，这个故事就更复杂了，不仅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将来建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哪些人来建立这个新的国家？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很冲动、很激烈的感觉，但民族主义也有政治的分歧，这就牵扯到意识形态和各种政党问题，将来新加坡、马来亚的政党如何？情况多么复杂，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仅是反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将来建国之后华人的地位如何，怎么使得华人能够得到平等待遇，成为当地的公民，有什么权利？当时讨论得很激烈，像我本来是爱好文学的，无形中就加入同学们的讨论后殖民时代的国家社会文化，但我的兴趣还是文化教育。

《时代周报》：当时你如何选择自己研究历史的题目？

王康武：我本来想要搞近代史的。当时“马共”在这里，英国的殖民地政府也好，当地的政党也好，很怕一切有关中国的事情，尤其是近代的，所以近代的书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书都不能进口。古代的都可以，近代的完全不可以。近代的史料不够，也没有档案可以看，档案有些在南京或者北京，部分在台湾，都跟政治有关系的，没办法看到，像我们这些海外的人哪看得到？

《时代周报》：你研究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在南洋的历史，充分利用了新加坡的地利之便，有什么新的发现？

王康武：我最初是想研究康、梁跟孙中山在新马的历史，这是我的第一个题目。我第一篇的研究文章是戊戌政变之后的改革派的活动，就是康有为的保皇党在各地的影响，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互相的斗争，在华侨的社会里斗争得很厉害，可以说是把华侨社会分裂成两部分。现代很多人不注意，其实当时支持康、梁的人很多，因为他们是有地位的，当过皇帝的老师。而且，他们逃出来是幸运得不得了，本来康有为、梁启超都会被杀掉的，运气好逃出来了，所以他们地位是很高的，大家都很尊重他们，尤其他们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孙中山有强处，是普通人，尤其在华侨私会党的影响很大。因为孙中山是从私会党里面出来的，当时的兴中会，后来的致公党都是这个背景的，所以，华侨社会里平民反而同情他。华南的“反满”精神还保持着，尤其是在私会党里。私会党是天地会、上帝会背景，在新马，1949年以后私会党还有一些保留着反清复明的仪式，天地会的势力还是有

的。所以，孙中山有他们的帮助，康有为就不走这条路，康有为的支持者一般是大商人，走正统的路线。我对那个问题很感兴趣。

《时代周报》：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与孙中山、黄兴一派，在1911年之前的角力是非常激烈的？

王赓武：非常激烈，现在很多人不大注意，以为国民党是必胜的，当时谁知道呢？这都是后来国民党写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我看到的一手资料，听人家讲的故事，从两派出版的报纸可以看得很清楚，都有各自的报纸，互相批判得很厉害的。平民是倾向反清，他们虽然尊敬康有为和梁启超，但是平民的集团就不欣赏保皇这一点，保皇就变成“保满”了。但看国家将来的发展，革命打起来了不得了，国家混乱。康有为很少讲这些问题，不过梁启超谈得很多，国家内乱的话，外国会更激烈地来侵略中国，为了保留中国的版图，还要维持着清朝，当然他还有很多复杂的理由。总之，他主要的想法就是保留中国的版图。像孙中山革命的路没有办法想清楚，革命真的打起来，外国人一定会插手的，不管是英国也好，日本也好，俄国也好，他们都等着看你怎么办，所以有这种忧虑。他们到处都争论，不论是在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香港也好，新加坡也好，在报上可以看得出来，最初两个势力是差不多的，不过光绪死了之后就完了。那么，康有为也没有好讲的，保什么皇呢？他的主要说法站不住。

《时代周报》：有一个史料讲康有为自称拥有光绪的衣带诏，到处捐了很多钱？

王赓武：有听说，到底是怎么样我不清楚。最初很多人支持康有为，可能一直到1905年还有人捐钱支持他。他1898年逃出去了，很危险，当时清廷要暗杀他，所以他到这里来是英国人保护。当时很多人愿意捐钱给他，就是要保皇，把慈禧太后那一帮人打倒，是清廷内部的分裂。到1908年就没有话说了，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

《时代周报》：孙中山也是一个募捐的高手，他到南洋来也是捐钱，听说演讲很有煽动力，广东人讲他是“孙大炮”？

王赓武：孙中山实在是很有本事，他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第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家。孙中山以前没有人谈政治，所谓政治不是政治，还是宫廷里面官与官之间的争斗，但是真正走现代化政治道路的，孙中山是第一个。当时像章炳麟他们在日本搞的政治不是政治，只是讨论、争论，只是讲思想、学术，讲中国的前途，那是组织政治。坦白说，中国是有组织政治这个传统，是私会党的传统，是反清复明

的造反，是老一派的打天下的观念，但那种政治不是现代化的政治，那是传统的政治。孙中山是在外国长大的，受外国教育，所以他知道外国的政治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没有这个概念，中国都是士大夫阶级跟宫廷里的人争执，或许在外面就是平民、武侠走江湖的私会党打天下的精神，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不是在上层就是在下层。但西方的政治不同，西方也不完全是民主政治，也有贵族，但是有政党的政宪，怎么组织政党，公开地一方面争权一方面讨论，有意识形态的争议，那是中国没有的政治。孙中山就有这种想法，也有别人想到，但他是第一个一生专业的现代化政治家。而且，他不仅是讲，他还是一生不停地把全部精力放在现代化的政治，但成败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成不成功我不敢说，他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成功的，但他就是不停地在做，而且公开地谈政治。革命政治的各种手段他都考虑过，打也可以，谈也可以，去妥协去交涉都可以，这是新的政治手法，而且是公开的。其实谈起孙中山，没有别人像他那样的，黄兴就没有他这一套，黄兴到底还是比较传统的，其他人更不比他了，章炳麟根本就不是政治家，是伟大的学者。孙中山是政治家，后来的青年学生就学他了，像汪精卫、胡汉民都跟着他，学他的组织性。后来，士大夫阶级家庭的书香子弟，就看清楚老的一套说不通了，跟孙中山走新的路。但这是少数，大部分士大夫阶级的人不走这条路，还是传统，他们后来也是因为科举制度停了，没有办法才考虑参入到政治去，一直到五四运动才真正地转变过来。那时候孙中山已经打下一个基础了。

《时代周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清政府倒掉了，南洋的普通老百姓怎么看这种政权的变化？

王康武：没有直接的材料来了解他们有什么看法。普通的百姓都很辛苦的，也没有念过什么书，不过他们也可以看看报纸，最少口头传给他们知道。我猜想，因为他们都有私会党的背景，这些所谓的同乡会组织的背景多多少少有反清复明的概念，所以他们对清廷没有感情。对清廷有感情是士大夫阶级，普通人对清廷没有什么感情，尤其是南方人。因为清廷在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些地方杀得那么厉害，江苏、浙江也受影响，所以南方人一般对清廷没有感情。连北方的汉人可能也没有什么感情，不过他们也习惯了，跟他们待得更久一点，北方人的风俗习惯可能跟满洲人比较接近。南方人根本不同，很多想法出发点都不同，所以从他们的观点来讲，清廷打败了是好事，但是什么人来代替呢？孙中山就是他们的领袖，大家都承认他是第一任的临时大总统，他居然说来建一个共和国——中

华民国。没有人真的了解共和国,可能孙中山当时少数的几个人知道什么是共和国,而且这个共和国的概念根本就是海外的概念。我看到一些别的材料,在香港已经有别的人考虑到了,不只是孙中山一个人。总之是在香港长大的这些人,受过外国教育,就考虑到皇帝这个概念行不通的,把清廷的皇帝赶走之后,谁来做皇帝?哪一个汉人有资格做皇帝?这个概念已经受到许多人的怀疑。孙中山也不要做皇帝,他也自认没有资格做皇帝,但有一种新的制度——共和国的制度。在香港,19世纪已经有人在报刊上讨论这个问题。孙中山就是从讨论之中也想到共和国,什么是共和国呢?武昌起义的时候,没有人有一个真正的蓝图,后来商量了,黄兴有他的想法,孙中山有他的想法,各有各的想法。在北方的袁世凯根本不懂共和国,他都要做皇帝了,成立共和国,他也是不得已,当总统,他不懂总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最后也当皇帝了。他没有别的路好走,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总统,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汉人之间心里也大概了解,哪一个汉人有资格做皇帝?袁世凯绝对没有资格,所以他要当皇帝,大家都反对:你有什么资格做皇帝,你根本就是一个傀儡,你还是一个失信的人。那种情况实在很乱,海外华人怎么懂得中国该怎么办?总之,把皇帝赶走大家都愉快,是好事,但是用什么东西代替,大概也不清楚。既然是孙中山,大家也很支持:他也是我们南方人,而且在南洋待过的,大家也捐过钱给他,也听过他以前是多次的失败,最后还是找他来做总统,大家当然支持他。没多久又大大地变化了,南方人怎么能接受袁世凯,这个袁世凯不管当皇帝也好当总统也好,都没有这个概念。我看了许多材料,支持孙中山的人不少,他成立了一个中华革命党,后来成为国民党,但是跟他的不少人,对他的组织没有太多的了解,总之他是我们的领袖,有个人的号召力。还有一点,南洋在清末已经开始办华校了,不过华校就是小学而已,福建、潮州、广府、客家都办小学,会馆支持自己会员的子弟上学。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就变成新式的学校。

《时代周报》:在马来亚大学毕业以后,你为什么到伦敦大学去留学?

王赓武:我还是希望搞学术,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的很多同学都当官去了,我没什么兴趣,但是我很感兴趣大学的工作。老师们也鼓励我申请奖学金,申请到了,就到英国去读中国历史,根本就准备走学术的路。我的硕士论文写南海贸易,后来博士论文是写五代。当时我决定要把中国历史搞好,所以选的是唐宋,我对五代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我想了解中国20世纪分裂得那么厉害,军阀跟唐朝的藩镇情况有点像,把唐朝这么一个伟大的帝国分裂成藩镇,尤其北方

分得特别厉害，结果把整个帝国成为五代十国，我想要了解怎么统一。

《时代周报》：你研究唐宋之间的历史跟清末民初的历史，觉得在历史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王赓武：我并不敢说相似，总之，好像是同一个问题，也是《三国演义》开始的那一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会分，分了之后为什么又会统一起来，可以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有这个问题。清朝垮掉之后，分裂得多么厉害，政治、经济的牺牲都很大，一直到1949年解放。当时老实说，解放，我是非常高兴，我认为是好事，华侨之间不一定都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很多人是支持国民党的。我年轻时根本没有什么党派背景，我认为中国统一，好事；解放了，好事。我当时很感兴趣，但是怎么样统一法？唐朝是了不起的一个大帝国，那么容易就分裂了，藩镇争权很厉害，牺牲了一百多年，到五代十国，那么，宋朝怎么统一？我不敢说怎么相似，因为情况是大不相同，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很有意思。我想了解一下，所以我写五代。后来我不写十国，因为题目太大，我集中讲北方的历史。其实我的兴趣还是在南方的，我本来对北方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下了不少功夫去了解北方的情况，后来注意到整个中国历史统一都是从北方统一的，南方打不下北方，每次都是北方把南方统一起来。从头看起，三国以后，两晋、五胡乱华，后来到隋唐，是从北方统一。到了宋朝，南方没办法，结果还是被蒙古从北方打过来。明朝可以怀疑是从南方打上去的，也不一定，因为明朝是淮河那一带打上去的，淮河到底还是南北之间的一段，但很特殊。满洲也是从北方打过来的。毛泽东还是要到北方去打胜仗，从北方，从延安，从东三省打到北京，最后统一中国。差不多每一次中国历史都是北方比南方强，所以我那时候研究五代史就对北方下了不少功夫，真不容易，因为我对北方没有什么意识，我从来都没去过。最北就从南京过江到我家乡泰州去，我所了解的都是南方，我生长认识的所有华人都是南方人，所以对北方没有印象，就是历史书看到的。我从前了解北方都是从《史记》、《资治通鉴》看来的，所以要了解北方的政治、社会、地势，相当辛苦，我现在还不敢说是真的了解。

《时代周报》：你在香港大学任校长十年，又在新加坡十五年，香港跟新加坡有没有可比性？

王赓武：可以比较，也有很大的区别。两者都是英国殖民当局留下来的制度和政策，行政制度、法律制度、政治经验，是殖民地过渡的经验，有很多相同的地

方。大的区别就是,香港可以说是纯粹的华人地方,还是纯粹的广府话的世界,大家都要说广府话,不管上海人也好,潮州人也好,到了香港来一定要说广府话的,这是一个广府人的世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很杂的,虽然四分之三是华人,但是事实上华人之间分别也是各种各样,当时不统一,现在还比较统一,福建、潮州、广州、客家各有势力范围,在商界也好,在政界也好,都是有关系的,加上印度人很多,马来人很多。文化、历史、宗教、语言都不同,所以很复杂,这一点跟香港完全不同。而且,香港基本上是中国的地方,没有人能够否定,回归是很自然的问题,当然英国人不愿意,这跟新加坡完全是两样的。新加坡绝对不是中国人的地方,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一点准备都没有,忽然变成一个独立国家,像李光耀这一批人很不简单,没有一个基础,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小岛,一个港口,一个贸易中心,一个市场,突然变成一个独立国家,怎么生存?这是很大的问题,既然被国际上承认是一个国家,那么是什么国家呢?很有意思,变成一个移民国家,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移民后裔,没有一个真正的本土人。这个国家跟亚洲所有的国家都不同,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移民国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外来的人,南美土著还比较多一些,像墨西哥还比较多一些,但是整个北美土著是少得可怜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外来的,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都有,都是移民。所以新加坡变成了亚洲一个很突出的国家,跟所有亚洲国家都不一样,跟香港完全不同。而且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情况就不同了。新加坡建国那一代的人跟现在年轻的新加坡人有国家概念,他们为国家建国,当兵很自然,他们出来代表新加坡。香港是中国,他们的出路就有许多困难的地方,也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外国要离开香港,也不愿意再理香港人,所以心里也比较复杂。我有时候看到年轻的香港人,很同情他们,也很了解他们心里比较复杂的。原则上总有一天他们应该真正回归到成为中国人,但他们也不晓得怎么样去应付,至少不停地在讨论这些问题。新加坡就没有这个问题,新加坡的问题是怎么能够生存。这么小的国家,在很复杂的东南亚中间如何生存是新加坡的问题。新加坡没有资源,这是贸易中心,海港,而且可以说是英国军队的大本营,整个亚太区英国的大本营,位置很重要。

《时代周报》: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对这个移民国家来讲,1965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你研究了中国人到南洋的历史,之前中国人是因为在本国没办法生存才到南洋来?

王康武：中国人没有“移民”的概念。移民是不得已的，都是战争、水灾这些灾难避免不了造成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不应该的，儒家的思想都是要留在家里的，“父母在，不远行”这种概念是很强的，家乡观念非常强，所以中国人没有移民的概念。从前，他们来南洋都不能算是移民，可以说是一种难民。有些是朝代改换的难民，像元朝打下宋朝，有些人就出来了。所以，华人在东南亚活跃是在宋朝开始。五代的时候，因为中国分裂了，南汉的经济力量是靠外贸的，福建、广东就朝南洋发展，那都不是移民，是不得已做生意。或者有些是逃犯，犯了法逃掉了，不敢回去了，是逃民。那种情况下，中国没有移民的概念。在中国政府方面，不管是明朝也好，清朝也好，都有海禁。在中国民间方面，出国是一种不孝不忠的行为，你的责任应该是在家里养父母的，跑出去是不孝。那么对皇帝来讲，跑到外面去的一些人代表外国跟中国做生意，那是不忠。所以，一般的中国人是不愿意出去的，而且出去了之后回来很麻烦的，因为中国的政策是出去了算犯法，基本上把出国当作一种不孝不忠不自然的事情。另外一个移民的概念，明朝时，跟郑成功那些人打败了之后到台湾，或者到吕宋、越南、马来亚；清朝时，太平天国打败了之后逃出来的人。移民的概念是最新的，最初因为没有移民概念，在海外的华人都当成华侨，其实很多不是华侨，是华人的后裔，侨居的概念不同。但是，最早的华侨，土生移民，好多代以后就不是侨居，根本家就在这儿，跟中国没有关系的，来自中国什么地方都不清楚，说他侨居是不对的，他其实是华裔或者土生华人，这种人在南洋多得很。19世纪到美国、澳大利亚去的那些人还可以说是华侨，但是从宋朝到19世纪到南洋来的那些华人很多都同化了，跟当地妇女通婚了之后生了孩子就留在这儿，都变成当地的人了，这些都不是华侨，都是土著了。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有一批人是伊斯兰教徒，他自己也是伊斯兰教徒。明朝把元朝打败，在福建泉州，蒲寿庚他们是元朝的色目人或者色目人的后裔，他们是伊斯兰教人，怕明朝对他们不好就跑出来了，故事非常复杂。

《时代周报》：从1965年到现在，新加坡由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四十几年的崛起有什么秘诀？

王康武：秘术很多，当然跟本地坚决的政治组织、行政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李光耀手下那批人是很能干的，下决心要把这个国家搞好。本来新加坡为了参入马来亚费了很大功夫，争取新加坡部分的主权，辛苦了多年，后来被排除出去很危险，所以他们的危机感非常强，共同的理想就是把新加坡建成有所为的国家。

那一代为了建立一个国家牺牲了不少。另外一方面，冷战对新加坡是有帮助的，新加坡不得不站在反共的立场，不是反华，是反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两个超级大国夺权的时候，新加坡站在一方。那么，站在这一边对新加坡港口的地位、贸易的网络非常重要。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都有不同的民族主义、排外政策，新加坡不能够走这条路，相反地欢迎外来势力，危机感帮新加坡在这种不友好的情况下维持生存问题，因此就欢迎大家来投资。这是“改革开放”的概念，所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英国都来这儿投资。新加坡跟中国不同，中国人口那么多，工业方面发展条件是很好的，一般的工人非常穷苦，而且所以物价便宜，工资低，大家都愿意将大型的工厂建在中国。新加坡很少人，也没有别的资源，所以新加坡不能做廉价劳工的工业，新加坡政府考虑到上层的工业，能够吸引外资，而且工资也高些。中国吸引投资是靠廉价劳动力，新加坡是利用知识经济，所以就非常重视教育，一方面使得外资很愿意来，另外一方面是尽量把新加坡人的文化水平、教育水平、科技水平提高到可以适应这个新的需要，效果不错。

《时代周报》：世界上不时出现民族的纷争，新加坡有多元的民族，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有不同的文化，但现在冲突不是很强烈，相对显得比较和谐，为什么会这样？

王赓武：最初，新加坡也闹过民族之间的冲突。1950年代是马来人跟英国人、白种人之间的矛盾，也牵涉其他的民族；1960年代是马来人跟华人之间的冲突，也死了不少人，华人之间也有矛盾，有政治方面的争论，也有牺牲。这些经验使得新加坡政府建国之后就采取一种可以说是相当严格的政策，就是有些敏感的题目不允许自由发挥，所以很多人就骂新加坡不民主、不自由，骂得有它的道理，新闻界的报道不能够随便讲话，控制得很严格。英国的制度是相反的，就跟香港一样，报章都可以讲，在香港没问题，百分之九十九是华人，政治上、世俗上的问题都可以讲。但是一旦牵涉宗教、民族，多元民族的社会是很复杂的，新加坡限制言论，一切有关所谓敏感问题不许自由报道，控制得很严格，所以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能谈，只能谈好的，不能谈坏的；宗教的问题不能谈，只能谈好的，讲和谐，不能讲别的，不过到最后结果是有帮助的，也是因为地方小一点，容易一点。中国就不那么简单，国家那么大。从政府观点来讲，用各种方法不让任何民族住在一个地方，尽量使得各民族能够混合在一起住，“组屋政策”是尽量地使每个组屋都有多元民族，不允许纯粹一个民族的组屋。当时反对的人很多，但是也行得通了，现在大家

都习惯了。所以，每个区都是多元民族，而且各种活动都是鼓励多元民族参与，不鼓励分开，尤其鼓励年轻一代的人。老一代的很难改了，年轻的一代在学校里都是多元民族的，没有一个纯粹民族的学校。可以说各方面是社会工程，上层来指导怎么样使得各民族、各种宗教能够和谐地一起生活，尽量地鼓励，不仅是容忍，而且想办法互相了解。容忍不够，容忍你还是看不起他，不理他，但是要尽量地了解，接触，有来往，这个是很大的工程，我不敢说已经完全成功了，这还是一个过渡期。还有一点，可能是比较有争论的，就是一个共同语言是英文，换句话说，也不理任何人自己的语言，你们可以自己讲，但是共同语言是外国人的语言，不是任何人的语言，而且这个语言蛮方便的，还是个国际语言，学了之后各地都可以用。所以这种单语政策是很有争论的，很多人不赞成，不过这种政策对于民族融合、互相的沟通就有很大的帮助。现在议会里开会当然可以坚持用华语、马来语，都是官方承认的，但是共同语言是英语。起初有人反对，现在大家都接受了，习惯了。别的地方可能做不到，只有新加坡做得到。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模式”，新加坡人有没有讨论过“新加坡模式”？

王康武：这点新加坡还是比较谦虚的，不敢说有什么模式，因为它不能作为任何人的模式。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亚洲没有这种移民社会，世界上也没有多少，移民社会是新的，都是在南北美、澳洲、新西兰跟新加坡。中国反而可以成为一个模式，但新加坡不能成为一个模式。新加坡是社会工程，工程里什么都有计划，有控制，不能随便任意地去放松的，所以这个政策不是大家可以学，不好学的，学了之后会有反感的，大家说不自由。但是这种不自由，公开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为了社会和谐。

《时代周报》：你在马来亚、中国内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新加坡都生活过，现在脑子里面国家的观念重要吗？

王康武：国家的观念一方面很重要，但过分地重视就有害，这是几十年的经验给我的想法。国家概念是重要的，我本来从小就有一个很深的国家概念，我的国家是中国。所以，到最后不能保留我的中国身份，在外国工作，入了外国籍，这当然影响了我对国家的看法。我对国家的看法就松懈了一点，以前很简单的，现在不简单了。但我现在发现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全世界很多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全球化的经验影响了很多的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人,在各国工作过的人,到处工作、教育、生活,多多少少都有同样的经验,这些人的国家概念就冲淡了。还是仍旧重要,因为一个人到最后还是有认同感,以前,我们中国人的认同感主要还是家庭的感觉,家庭认同比任何认同更重要。中国人的出发点是家庭认同。但是这几千年来慢慢地演变了不同的情况,从前的天下观,不仅中国人有,其他人也有,佛教有佛家天下,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各有自己的天下观。到现在也是如此,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他们同教的人就是一个天下。

我们中国人的天下观就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中国人的天下观一直在演变,理由也可以说是被外族侵犯了很多次。五胡乱华,鲜卑、拓跋族一直打到南北朝,北朝根本就是外族。连隋唐的祖先都是外族,唐朝就很明显了,唐朝的贵族都是外族,被同化了,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当然是中国文化,但是没有一个民族的概念,以文化为主体,接受了这种文化,就可以成为这个主体,是同一个天下。但说起天下,中国人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真正虔诚地信仰佛教的人,他的天下是在印度,佛出生的地方,西天是他们的天下,中国并不是他们的天下,所有的佛教人都有这个概念的。到现在为止,你到印度去旅行,在佛教的圣地里看到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斯里兰卡人,信佛的人都去拜圣。中国的天下概念复杂了,有两层,一层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天下,有政治意义的,一层是宗教意义的,尤其是儒、佛、道三教融合起来的概念,来源就不重要了,不停地演变。唐朝是外族人都可以自由地出入,入汉或者不入汉也可以。到宋朝就不同了,宋朝不停地打仗,而且不停地被人家打败,辽也好,女真也好,契丹也好,还有大理、越南这些国家,所以慢慢天下这个概念也缩小了,变得越来越是儒家的世界。所以,那时候的新儒家就是宋朝的理学,到了张载、程颐、程颢、朱熹,他们那一套东西变成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所以天下观念缩小了,也包罗一些佛教、道教。宋朝又被元朝打败了,成了蒙古人的世纪,差不多一百年,在那种情况下,民族的概念就渐渐形成了。朱元璋推翻元朝的时候已经有一种民族性的概念。明朝已经有一种民族性,但是这个民族性还是比较宽大的,容忍各种民族,但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把朱熹的那一套作为明朝的指导思想,当然后来还有王阳明,不过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所以变成儒家天下。儒家的贡献可以说矛盾得很,从孔子起,四书五经都是天下概念,皇帝就是天子,还是天下概念。但是中国一般人民之间的民族性已经很强了,因为给人家欺负,至少要自卫。后来把岳飞的故事拿出来,“还我山河”,可见民族感已经相当